

第一章 制度新民族立 江山始奠基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①

——毛泽东

1949 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一年。

1 月，世界闻名的文化古都北平和平解放，结束了 1948 年 9 月开始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歼国民党军队 154 万余人。至此，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它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

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3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

^①《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版。

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

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在西柏坡的工作，迁往北平。

十几天以后，也就是 1949 年 3 月 23 日，在太行山东麓蜿蜒曲折、崎岖不平的土公路上，一支由几十辆吉普车、卡车组成的混合车队，正自南向北疾驰，后面扬起的烟尘犹如滚滚长龙。

这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车队。

车队从西柏坡出发，沿着寿灵一行唐一曲阳一唐县一保定一线，向北平开进。在车队前面的几辆吉普车上，坐着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经过两天的旅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于 3 月 25 日上午抵达北平西郊颐和园。短暂休息之后，他们又驱车去西苑机场。

北平各界群众代表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早就迎候在西苑机场，激动地等待着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到来。

下午 5 点，毛泽东等人的车队驶进西苑机场。

欢迎人群中立刻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欢笑声，军乐队奏起雄壮欢快的乐曲。

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当地军政首长林彪、聂荣臻、贺龙等立即向前迎接各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北京市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界，都推选出了自己的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6—1427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代表，来这里欢迎他们仰慕已久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同他们亲切见面。

接着，毛泽东等又来到民主人士欢迎行列前，同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人一一握手问候。

还没有等天色暗下来，天空忽地升起一颗耀眼的照明弹。紧接着，一颗又一颗雪亮的照明弹腾空而起。整个西苑机场如同白昼。

阅兵式开始了！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在受阅部队前缓缓驶过。

展示人民解放军雄姿的步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化步兵受阅部队的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英气勃勃。

领袖们高兴地向指战员们亲切还礼。

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宣布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等已胜利到达北平！

而建设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了。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集没有反动派参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成立新中国等。会议认为：1949年和1950年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两年。

1月8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财政、民主党派和外交问题的发言，指出：分权和集权要适当，过渡时期，不要太急。银行发行权要统一，铁路集中归中央管理。渡江南下，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从兵源到装备等事情都要一件一件地解决。党外人士现已来得多了，我们要把主张明朗化，便于他们了解。外

交上我国人民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要反对恐美媚外，增长自己的志气，去掉国民党的买办作风。

1月14日，为了搞好新中国建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云、林枫电：同意聘请328名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但须先商定一套待遇制度和合作办法，以便共同遵守。

1月1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毛泽东作了审批。《指示》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的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这样，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外交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步骤上，则应按照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和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指示》对于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外国记者等项，都规定了暂时的政策。

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抵达西柏坡，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其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会谈。

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阐明了中共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同时着重说明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问题，强调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周恩来与米高扬就战后经济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

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外贸管理以及中国民主党派等问题，进行了单独会谈。

2月初，由于人民币已经成为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财政来源，为增加人民币的市场投放量，派薛暮桥（时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到北平会同南汉宸（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清查国民党留下来的钞票印刷机和印钞纸张，计算钞票印刷能力；同时就货币发行方针问题向陈云、董必武征询意见。并决定增发定量纸币，以供给南下部队及各地投资恢复工业生产。

2月14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华北局及平、津两市委电：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即将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到北平。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多数已去北平，现再将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去，是为了能集中起来协商大计；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

25日，林伯渠陪同35位民主人士乘专列到达北平。

26日，中共北平市委等四单位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

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如何对待各民主党派的指示。内称：（一）在新解放地区，对于1948年5月1日以前即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以前即已成立，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加以保护。（二）各民主党派可以党派名义进行活动，并发展党员或会员。（三）我地方党领导机关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

2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废除国民党立法文书和确定解

放区司法原则。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精神下，批判地、个别地采用和修改一些，而不是基本采用。

3月14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在座谈会上，中央研究了华东、山东、浙江、上海、东北等地的干部配备和内蒙问题、铁路问题，会上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市长兼市委书记。山东分局改为省委，由康生、张云逸等负责。浙江省委由谭震林、谭后龙负责，铁路部门党委书记由滕代远任。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为副书记兼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会议还决定，由西北、东北、华东、华北、中原抽调 53000 名干部到新区工作。

3月中旬，为了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起草并下发实行《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仍成为必要。但是，全国财经和后方勤务工作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对于新区的领导机关，应该给予较大的机动权。

《决定》还对如何统一新老解放区的财经和后方勤务工作作了全面的部署。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从 20 日子夜起，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 500 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4月23日，南京解放。

统治中国 22 年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覆灭了！

在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上，当务之急是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早在 1948 年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已经提出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

1948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

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电，要他们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报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并把这个讨论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这以后，周恩来一面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一面帮助爱国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并同他们就召开新政协的问题进行具体磋商。

9 月间，周恩来拟定了邀请到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民主人士 77 人的名单，并征询了上海、香港分局的意见，希望各方人士在今冬明春进入解放区。

9 月 20 日，周恩来又提出准备在北平、天津邀请参加新政协的代表性人物名单，其中包括张东荪、吴晗、李烛尘、许德珩、张奚若、费孝通、徐悲鸿等。

应中共中央邀请，原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人士，从 1948 年秋开始，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进入解放区，周恩来对他们的安全、接待问题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

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他们在 9 月 29 日到达哈尔滨。10 月 5 日，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去电表示欢迎，告诉他们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

10月下旬，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到达东北解放区，李富春、蔡畅代表中共中央对冯玉祥不幸去世表示慰问，并邀请李德全参加新政协会议。

11月初，周恩来开始主持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茅盾、柳亚子等30多人到达东北解放区。

在这个时期，先后到达河北平山李家庄的有周建人、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沈兹九、宦乡、吴晗等。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信的全文是：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亟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子皓^①

宋庆龄接到信后，因当时身体有病，不宜旅行，暂时未能

^①李海文主编：《周恩来的足迹》，第83—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

动身。

次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在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望即邀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经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由于环境的原因，他们一时也未能成行。

2月27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审阅修改《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会议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并批示将它们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

本来，周恩来同中国共产党以外的这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着多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在他们中间他熟悉的朋友，比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更多。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3月5日至13日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所以他在3月25日才到北平。一到北平，尽管他立刻投入紧张的和平谈判，但20天的谈判过程中，他先后在4月5日、13日、14日、16日、17日分五次邀集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会面，向他们报告和谈进展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5月5日，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的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参加的有许多科学界、学术界人士和各大学教授。

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讲话。

他从“科学”和“民主”讲起，叙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曲折历程和经验教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同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他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指出这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由30年来的斗争事实所承认和肯定的。

他最后说，这几十年来，我们很闭塞，以后见面的机会多，

各位在某一方面说来都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

第一，我们共产党人在建设上很差，甚至可说是无知。但我们为什么敢说领导建设呢？政治上局面已经打开，这是建设的先决条件。

第二，在建设上我们做一个小学生，向大家学习。

第三，我们知道如何推动和组织大家一起前进。

大家都长于一样而短于另一样，只要组织起来，就能共同建设，建设还是要依靠各位，希望大家和广大工农结合起来，努力建设新中国！

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

对各民主党派民族工商业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十分关心。

5月26日，周恩来同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等座谈，说：现在的中国，应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因此需要各党派的合作。民主建国会的成分有工商业者、退休工商业者、与工商业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因此，民主建国会应把工商业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密切结合，团结、教育、领导工商业者，为经济建设服务。

这时候，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时机已渐次成熟了。

6月1日，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有134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等。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

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

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了开幕词。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先后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①

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他说：起草共同纲领是 6、7 两月份一个繁重的工作。过去我们起草过一两次，因为当时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因此重点在动员全国人民力量，支援战争上面；而现在的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周恩来同时强调，这次会议期间，凡是重大的议案不是光在会场提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的。

会上，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条例，还通过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名单。

6 月 15 日当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加快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政府组织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①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63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共同纲领的初稿。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共开了五天，在 6 月 19 日闭幕。参加会议的成员有着广泛的代表性，整个会议的气氛是团结和谐的。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政协筹备会的党组干事会，由 21 人组成，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为常委，周恩来担任书记。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一切筹备工作继续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及其领导的六个小组分别担任起来。周恩来则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起草《共同纲领》。

协商代表名单，需要包括广泛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各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需要显示出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人少了，便不能完满地代表全国各阶层的人士。但又必须有严肃的要求，照顾到相互间的协调与平衡，并能为各方面所接受，取舍恰当，十分不易，这可以说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

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一般先有单位提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磋商，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

受到全国人民尊重的宋庆龄，那时还留居上海。

5 月 27 日上海一解放，周恩来立刻写信向她祝贺：“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①接着，派邓颖超和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去迎接她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因为孙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宋庆龄对廖梦醒说：“北京是

^① 《渴望同先生共商建国大计》，《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41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版。

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

廖梦醒说：“北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

宋庆龄说她想好了再通知廖梦醒。

过了两天，廖梦醒接到她宴请邓颖超的请柬。

几次交谈之后，邓颖超把宋庆龄说服了，同意北上。

当时有三个单位都提出要推荐她为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征询宋庆龄本人意见。宋庆龄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

邓颖超提议：以宋庆龄为特别代表，请中央批示。以后，在新政协代表名单中，除有 45 个单位的代表 510 人，候补代表 77 人外，还有经筹备会常务会同各方面协商后确定的特邀代表 75 人。特邀代表中间有宋庆龄、陶孟和、张难先、张元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周信芳、梅兰芳、赛福鼎等。

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筹备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

这个《共同纲领》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外交政策。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8月28日，宋庆龄由邓颖超等陪同从上海到达北平；9月7日，程潜从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到车站迎接。

9月初，已确定的政协代表有 440 多人来到北平，超过代表总人数三分之二。

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代表作《关于中

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共讲三个问题：

- 一、关于参加人民政协的单位及其名额和人选问题；
- 二、关于人民政协组织法草案；
- 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

当晚，周恩来又将《共同纲领》草案分送各代表，组织他们进行讨论。

9月17日下午3时，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

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三个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并且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出席开幕式的有参加会议的代表 634 人，来宾 300 人。推出毛泽东等 89 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台布置得庄严大方，中央并挂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上面悬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大会宣布开幕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 54 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庄严地宣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①

是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这句话喊出了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人民曾经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进行了百多年可歌可泣的斗争，才换得这一天的到来。

9月27日、29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议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共开了九天。

9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通过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后，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政协会议虽然立了国，但还须有个盛大的仪式，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知晓这一改变历史的大事。

首先是要确定开国大典的日期。原来并没有想到过会在1949年立国。然而，形势发展得太快。1946年时，还估计要用五年时间才能打败国民党。

^①《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毛泽东曾选了 1950 年 1 月 1 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日。谁知，人民解放军很快进入了平、津这些大城市。看来，等不到 1950 年元旦这个日子了。于是，立国的日子就定在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这一天也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日期定了，接下来便是选择举行大典的地点。

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要举行阅兵，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事情，参加阅兵的部队，也早已训练好。

因此，在地点选择上，首先要考虑是否有阅兵场地。

当时，有两个地点可供选择。

一个是西苑机场，这里场地开阔，离市区又远，也影响不了市内交通。然而，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要举行大型阅兵式，就得建造一个检阅台，其工程较大，耗资也较多。另外，机场离市区远，群众的往来有困难。

另一个地点，就是天安门广场，这里有天安门城楼，这是现成的检阅台。而且，它位于市中心，群众往来方便。不过，阅兵场地略显狭小，而且还要阻断市内交通。

华北军区将供选择的这两处上报中央后，周恩来经再三考虑，才决定下来，大典地点选在天安门广场。

然而，广场需要清理，才可用于阅兵。杂草丛生的天安门城楼，需要装修粉刷，广场上需要立旗杆。可是，离 10 月 1 日只有 20 多天了。

于是，市政府向各界发出号召，动员人们清运垃圾。最先起来响应这一号召的是几千名学生，他们义务地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垃圾清理工作。这样，广场终于面貌一新。

天安门城楼的装修是比较困难的。大会筹委会把这一工作交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后，宣传部又把它交给了文工团的舞美队，舞美队的苏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两个日本人。

这两个日本人，分别叫肖野和森茂，都是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生。一个因为做了左翼美术家而逃到中国避难，一个是从驻华日军部队投奔过来的。

两位美术家认为，装饰后的天安门城楼既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要有浓厚的节日气氛，这才合体。要达到这个标准，可以说，宫灯是最好的集合物。于是，他们计划，在天安门城楼的十根廊柱中间，悬挂八盏大红宫灯。

由于每盏宫灯都很大，只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制作。于是请来了扎灯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在他们夜以继日的操作之下，终于在大典前一天竣工。

天安门城楼粉刷一新后，要悬挂毛泽东的画像，还要书写两条标语，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这个任务责无旁贷落到了延安满城标语的书写者钟灵身上。可是，与过去书写的标语相比，这次多少有些不同，因为，这一次所要写的字，每个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这就要经过反复地测量。大典那天，站在广场上的人看到那两行宋体字，可真是既醒目又漂亮。

最费心的，可以说是旗杆的设计和安置了。安装旗杆的土木工程并不困难，只要在天安门广场的石板地上建一个三平方米的混凝土墩，再在它的周围修上围栏，并在其中心竖一根 22 米高的铁管，这就成了。

问题是如何把旗升到旗杆顶上去。让毛泽东从城楼来到旗杆下拉动绳子升旗，这显然既不现实又不理想，于是，有人提出，采用电动升旗，主意虽好，可难度太大了。

尽管如此，建设局的同志还是决定试一试。他们将升旗的电钮安置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然后用电线将它和旗杆基座里